

# 战略环境变迁与国家利益界定

## ——中国国际角色的思维革新

王俊生

[关键词] 国家利益界定；中国角色；战略环境变迁；内部变量；外部变量；思维革新

[摘要] 本文以战略环境变迁为分析背景，通过分析新时期中国国家利益界定与维护所出现的新情况，探究中国国际角色应具有的思维革新。本文把中国国家利益分为国内和国外两个变量，提出了经济发展、两岸统一、社会凝聚力和政权合法性建设、引导国民健康的历史观与大国心态、周边安全和领土收复、国家形象建设、海外利益维护等七项利益。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将其划分为核心利益、根本利益、以及重要利益三个层次，并指出了利益维护所应注意的问题。在结论中，本文也提出了在国家利益界定与维护、以及学术研究上需进一步重视的问题。

利益是人类古老的话题。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sup>①</sup>。虽然他谈论的是商人逐利，但反映的却是人们普遍的利益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伯里克利在雅典遭受军事失败后曾指出：“每一个人在整个国家顺利前进的时候所得到的利益，比个人利益得到满足而整个国家走下坡的时候所得到的利益要多些”。[1]伯里克利阐述的表面上看是个人利益获取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事实上，对于国际关系而言，国家利益始终是一个核心概念，是驱动国家间互动的最基本要素。乔治·华盛顿曾指出：“除了国家利益，人们别指望政府会在其他任何基础上不断地采取行动”。[2]法国学者雷蒙·阿隆也曾说过：“维护国家利益是一切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一国的外交政策除了维护国家利益之外，不受任何其他原则的约束”。[3]

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国家利益。即使在意识形态高度挂帅的毛泽东时代，无论是“联苏抗美”的“一边倒”还是“联美抗苏”的“一条线”，首要出发点仍然在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始终强调国家利益的重要性。1989年底在因学潮导致中美关系紧张的时刻，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我们都是现实的”。[4] (P330) 江泽民也指出，“其实归根到底一句话，外交工作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5] (P529) 2010年3月，温家宝总理会见记者时指出，“我们的外交政策基本出发点还是要维护国家的利益，最重要的就是主权和领土完整”。[6]

但在学术研究上，主要面临三个挑战。其一，尽管“国家利益”概念之于国际关系学科的重要性类似于经济学中的“货币”，但是其不可量化性所导致的难以客观衡量，使得在分析上争议四起。对此，本杰明·弗兰克尔 (Benjamin Frankol) 指出，关于国家利益的争论，如同民族国家一样古老；[7]其二，中国官方文件从来没有像美国那样公布过国家利益，以

---

※王俊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①完整话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见《史记·货殖列传》，出自：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列传第六十九。

至于政府不同部门之间、政府与学者之间、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对国家利益的界定缺乏基本共识；其三，由于国家利益的界定与维护主要受内外环境影响，中国作为现代历史上发展速度之快少有的国家，相关环境变量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客观上给研究带来了很大挑战<sup>①</sup>。有鉴于此，本文以战略环境变迁为背景，通过分析新时期国家利益界定与维护上所出现的新情况，来探究中国国际角色所应具有的思维革新。

## 一、概念界定与分析背景

国家利益的概念并非从来就有，“王朝利益”演变为“国家利益”，从根本上讲是主权国家体系形成的产物。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现代民族国家通过代议制的形式，将个人利益上升为政府视野，所有国民个人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就成为国家利益。从这时起，国家利益反映的才是绝大多数国民的居于支配地位的价值与政策取向。而中央政府就成了国家利益的载体，新闻媒体中的“中南海”、“白宫”等称谓所反映的就是这种认识。但是在理论上，如何界定呢？

摩根索指出，国家利益界定应考虑双重因素：“一个是逻辑上所要求的，即在逻辑意义上必不可少的，另一个是环境决定的，是可变的”。[8] (P66-69) 克拉斯纳认为，在界定时必须符合两个重要条件：“第一，国家利益应该是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不是社会中一部分人或利益集团的利益。第二，国家利益在一段较长时期内应保持相对稳定”。[9] (P131) 约瑟夫·奈指出了体系层面的意义，“国家利益的定义实际上是由国际通用的规范和价值决定的。这些规范和价值构成国际生活并赋予其意义”。[10] (P2) 中国学者认为，国家利益界定要遵循三个步骤：“首先，做出核心假定，国家利益具有民族性、排他性、稳定性。其次，确定判定因素，厘清分析常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最后，引入辩证观点，从整体角度认知国家利益内涵与外延间的关系”。[11]

关于国家利益内涵，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也有较大争议。现实主义从实力角度强调由物质性的权力和安全界定。摩根索就指出，国家利益包括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和文化完整，其中最本质的是生存问题，其他都是次要的。[12] (P4) 沃尔兹以简约的模式分析体系结构时指出，生存是国家唯一的利益。自由主义则从国际制度规范出发，在承认现实主义前提下，强调国家利益中的制度性因素，以及应以“国际体系为中心的利益”代替“国家为中心的利益”，指出国家利益的组成并非单一，而是多方面并重。基欧汉就主张有三种利益并重：生存、独立、经济财富。建构主义学派主张以身份界定国家利益，强调其观念性。温特在基欧汉的基础上又加了第四种利益——集体自尊。[13] (P39)

中国学者认为，在中国，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一种认为不用研究，任何人都能理解。而另一种认为，国家利益不是普通人关注的范畴，是政治家的事。[14] 在界定上，学者多从需求出发，认为国家利益是“民族国家追求的主要好处、权利或受益点，反映这个国家全体国民及各种利益集团的需求与兴趣”。[15] (P161-162) “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需要的东西，在物质上，国家需要安全与发展；在精神上，国家需要国际社会尊重与承

---

<sup>①</sup>如 GDP 和外贸等硬指标的快速增长、国民的世界观、世界对中国的认知等。参见：王俊生，“世界大国与战略环境：中国国际角色的新课题”，《现代国家关系》2010 年第 5 期。

认”。[9] (P6)关于其分类，有学者划分为“崛起性的、发展性的和生存性的”。[16]也有学者根据生存与发展直接分为“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国际联系利益”。[17] (P296)

综上所述，尽管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分歧较大，但都承认：(1)国家利益受国内外环境影响，是一个动态的范畴；(2)国家利益是一个集合概念，需要转化为可操作的概念才能实证分析；(3)不同的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重要性是不同的，需要比较研究。考虑到中国是从当今国际体系的边缘逐渐走向内侧乃至中心、从改革开放前国内政治国际政治截然两分到改革开放后互动频繁，因此，本文把国家利益分为内部变量与外部变量。横向上，从安全、政治、经济等几个层面入手，通过比较分析的视角，总结出中国国家利益的轻重缓急，并指出在维护上所应该注意的问题。而要分析中国的国家利益，就不能不考虑所处的背景。

笔者曾在“中国当前的国际角色评估：实力·定位·认知”和“世界大国与战略环境：中国国际角色的新课题”文章中引入四个指标考察中国的战略环境：国际角色变化的动力、大国关系的新态势、国民的大国心态、国际社会的认知。前两者属于“硬实力”范畴，后两者属于“认知”因素<sup>①</sup>。第一，在GDP、贸易总额、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乃至军费开支等硬指标上，中国已名列世界前茅，其中最大的特点是增长迅速，属于典型的“崛起性”国家。第二，随着中国相关硬实力数据迅速上升，一方面，大国对华防范的一面更为凸显；另一方面，硬实力增强不仅使政府决策时拥有更多筹码，而且国民自豪感的增强使得中国在遇到西方不公正对待时，迫使政府采取强硬手段回应的社会压力在增大。第三，在中国国民心态上，趋于大气，包容开放；更理性看待中西方的差距，谦虚务实；基本摆脱了受虐者心态，平和宽容。第四，在国际认知上，一方面，随着中国持续的稳定发展，西方大国鼓吹中国崩溃论的观点已经鲜少见道；另一方面，也存在严重地夸大中国实力和错误想象中国发展走向的问题<sup>②</sup>。

## 二、国家利益的内部变量

以上述战略环境的变迁为背景审视中国的国际角色可见，今天建立在健康大国心态上获得较高的国际认知，恰恰同步于内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0多年后各项硬指标的迅速上升。这就表明，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提高及其可持续性，最终源于这个国家的内部强大。因此，尽管“国家利益”往往被视为是向外的一个概念，但内部利益的界定与维护仍然是国家利益讨论的起点与基础。特别是从历史上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来说——辽阔的国土、世界第一的人口总量、5000年的历史伸展等，只要内部健康稳定发展，想从外部搞乱、摧垮中国几乎不可能。也就是说，中国国家利益最大的部分还是在内部。从中国内部来看，有四点至关重要。

---

①参见：王俊生，“中国当前的国际角色评估：实力·定位·认知”，《中国与世界观察》2010年春季号。王俊生，“世界大国与战略环境：中国国际角色的新课题”，《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5期。

②最近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公布了一项调查显示，受访者当中，认为10年后国力最强的是“中国”的达65.5%，居第一位，严重夸大中国实力。见：Bates Gill, Michael Green, Kiyoto Tsuji, William Watts, *Strategic Views on Asian Regionalism: Survey Results and Analysis*, the CSIS Press, February 2009, P4, P5.另一项调查显示有一半的美国人(50%)认为中国力量的增长“很可能”导致冲突，而相对而言，只有较少的人认为朝鲜局势的管理不当(41%)和台湾问题(31%)会导致在亚洲的冲突。见：Quansheng Zhao, “Managed Great Power Relations: Do We See ‘One Up and One Down?’”,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0, no. 4-5 (August-October 2007), p624.

第一，保持经济持续发展，踏实解决民生问题。近当代中国历史上几次动乱乃至政权更迭都是在 GDP 等硬指标处于世界领先、而普通民众处于积弱积贫时。中国目前经济发展又处于关键的瓶颈阶段(人均 GDP1 000-3 000 美元)。从世界的经验来看，该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凸现与恶化，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导导致剧烈的社会动乱。中国在基础弱和底子薄的基础上建设现代化，解决所有民生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发展。尽管目前从与发达国家的对比来看，相关指标已非常接近，甚至某些还出现了超越，但两者最大的差距体现在民生问题上。从消费水平看，2008 年中国居民消费仅相当于美国居民消费的 15.4%。从消费结构看，食品仍是中国居民消费的主要部分。2008 年，食品消费占中国居民消费的 33.1%，而同年美国这一比重只有 6%。[18]而且中国目前还有 2 200 万城市人口维持最低生活保障，1 500 万人处于绝对贫困线，几乎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规模。就此可见，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是不争的事实。真正的大国要“民强”<sup>①</sup>。

第二，切实推进两岸统一。由于历史和国际因素，在台湾问题上，毛泽东与邓小平都曾提到“如果这一代解决不了就留给后代解决”的思路。江泽民虽然在出台《反分裂法》后曾提出解决台湾问题应有时间表，但后来也让位于形势发展需要。当然，欲速则不达，承认两岸目前统一条件不成熟符合历史客观态度。但必须看到，两岸的分裂状态不仅在政治上使中国深受他国“勒索外交”之累，比如美国对台军售，而且中国目前发展中所遇到的诸多问题，破解之道也需要纳入台湾因素。一方面，国内发展对外部资源的依赖越来越大，迫切需要一个安全的海洋通道。目前无论是经缅甸进入印度洋的海上通道，还是经中亚国家进入中东地区的陆上通道，都存在很大的不稳定性。长期来看，两岸统一后，中国可以有效解决出入太平洋、维护海洋通道的东海前沿基地问题，对通过马六甲海峡的中国海运安全将产生有效保障；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发展，周边国家对中国戒心越来越大，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有凸现甚至激化之势，从地缘上看，一旦台湾问题解决，两岸联手，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大有助益。更何况，台湾问题的解决也会从根本上突破自冷战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构筑的旨在封锁中国的环岛锁链。从解决的条件来看，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务实推动，两岸在经贸融和、文化交流等层面已经打下了很好基础，双方进行政治对话的条件正在成熟。更何况，从辩证的观点看，两岸分裂时间越长，政治融和与社会融合的难度将越大。

第三，加强社会凝聚力和政权合法性建设。现代科技手段的发展、特别是手机电脑等现代通讯设备的普及，政府已经很难用传统的管理平面媒体的手段管理舆论。高层领导的平民化，也很难再采取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垂直拍板”的领导方式。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对外交流便捷化和信息共享同步化，增强了公民的比较性和选择意识，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内政府治理的权威性基础。[19] (P413-415) 考虑到科技发展、领导人平民化以及改革开放呈不可逆转之势，因此，传统的凝聚力建设会遇到更多挑战，这又会影响到传统的政权合法性基础。加强社会凝聚力建设和政权合法性建设，必须下大力气进行文化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以舆论引导代替舆论管制，以政治民主代替政治威权，在人类共同价值观上多强调“普世性”少强调“特殊性”。如果这些工作做得好，就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直接影响中国长期发展稳定的内部根本利益。

第四，积极引导健康历史观与大国心态。历史上看，中国多数时间认为自己是“天朝上

---

<sup>①</sup>为此，中国在积极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已开始着力扶持三农缩小贫富差距，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

国”，不屑于与“蛮夷”交流，执行闭关锁国政策。近代以来，在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中发现了自身的巨大差距，又导致部分国民妄自菲薄，甚至把国家的落后归咎于文化，“言必称西方”。当我们今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他各项指标迅速上升时，一方面，要保持清醒与谦虚的头脑，切忌在外界捧杀与内部鼓动下急切的寻求大国权利。比如今年初，美国对台军售，会见达赖，国内不仅民众“完全有能力制裁美国”的呼声空前高涨，而且一些军方人士也明确表示，是到了清算美国违背“八一七”公报劣迹的时候了，“我们手中已经有牌了”，“老虎不发威，人家会把你当成病猫”。[20]抛开中国实力与美国还存在巨大差距不说，即使两国实力接近，我们也应借鉴布热津斯基在美国二战后实力达到巅峰、国内“自负心态”弥漫时发出的警告，“华盛顿如不改变无处不在的类似自负，一个世纪后，可能导致美国霸权及其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遭遇与英帝国分崩离析命运类似的命运”。[21](P6)另一方面，要自信与平和，不要妄自菲薄，更要彻底摆脱受虐者心态。由于中国近代屡被侵略与压迫，所以遇到他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不公正的待遇，很容易激起民族的历史联想，并因此过度反应。一个真正的大国首先应该是一个自信与平和的大国。相关的历史教训比比皆是。比如二战前的德国在崛起过程中，大肆渲染外强凌辱的苦难，强化受虐者心态，最终致使民族主义失控，酿成世界大战<sup>①</sup>。

国家利益内部变量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经济发展与两岸统一可以有效推动凝聚力建设，为防止凝聚力变成极端的民粹主义，必须积极引导国民健康的历史观与大国心态。而健康的历史观与大国心态，也会有利于经济发展与两岸统一。

### 三、国家利益的外部变量与海外利益

早期，由于社会发展和技术水平所限，人们所称的国家基本上都是“有边界”的，如初期的城墙、后来的长城。这一时期国家利益完全可以用一条线来划分，国家利益在国防线之内。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国家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家利益外部变量的影响增大。具体可以将其分为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由于外部经济和文化利益更多是内生变量的外延，因此，中国国家利益的外部变量主要有三点。

第一，今年以来中国安全问题的集中爆发不仅表明良好期望并不会自动转变为外界的客观认知，也表明了中国崛起已经处于瓶颈期，安全变量在中国国家利益中的分量愈加突出。安全是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础。随着冷战结束以及与西方大国相互依赖加深，中国安全环境大大改善。但今年以来，安全问题有集中爆发之势。美国执意推动对台军售，会见达赖，在黄海等中国邻海频频军演。日本民主党上台后，并没有如愿迎来中日关系的蜜月期，不仅扣押拘留中国船长数日，而且国内“厌华”“反华”情绪高涨。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态度强硬，并引入美国因素联合向中国发难。历史上看，由于国际资源的有限性，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引起既有大国与周边国家的防范与围堵。因此，中国安全变量的突出从某种

---

<sup>①</sup>2009年9月20日，美国华人在白宫南草坪升中国国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许多美国人也参加了活动。57个美国孩子表演了体操等文艺节目，每个参加者都洋溢着节日的热闹与快乐。试想，如果在天安门举行美国国旗升旗仪式，很可能招致国人谴责，视为对华挑衅。尽管两国国情与文化不同，但美国表现出的大国自信以及塑造国家形象的手段应值得中国学习。事实上，一个升旗仪式并没有给美国国家利益造成任何伤害，反而树立了开放自由的国家形象。

程度上也可以认为是中国自身成长中不可避免的“烦恼”。

中国的安全重心仍在于亚太地区的两大热点问题上：朝鲜半岛与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上，随着《两岸经贸协定》签订和大陆文化部长访台，两岸经济依赖进一步加深，文化交流和人员互访逐步常态化。两岸间爆发安全危机的可能性已大大下降。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不仅关系到中国东北朝鲜族聚居区的稳定和繁荣，而且由于与美日俄等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中国的整体安全利益走向十分重要。目前来看，对于因朝核问题和内部经济危机陷入国内外困境的朝鲜高层来说，在本次党代会后处于政权接班的紧要时刻，对华倚重的一面在加强。中国应借此机会，积极引导朝鲜走向开放与自信，成为国际社会正常的一员，降低危机爆发牵连中国被动卷入的可能性。[22]

第二，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相关硬指标上升迅速，国际地位与话语权得到很大提升，但是国际社会对华误解误读的一面凸显，政治变量也进一步凸显。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要想被国际社会接受为世界大国，以什么样的面貌展现于世界至关重要。因此，国家形象建设已迫在眉睫。除遵守人类共同价值外，有两点较为紧迫。第一，中国要成为世界认可的大国，就必须放大在其他国家心目中的可信度。为此，承担更多的地区与国际责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是必经之路。比如，第二次朝核问题爆发以来，中国投入巨大的外交资源搭建六方会谈平台，尽管在能否最终实现朝鲜“弃核”上还看不到结果，但此举对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正面意义巨大。第二，严惩国内的铺张浪费与贪污腐败。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说到底，国家形象是一国内部形象向外界的真实表达。各级政府出于热情或排场接待外宾时的铺张奢华对于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政治制度的西方人来说，正好验证了其偏见与诟病。对于经济往来中设置关卡索贿的做法，丢掉的更是整个国家的形象。

第三，随着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商品和劳务出口、工程承包、境外投资等方面取得长足进展，公民出国求学与旅游也越来越多，海外利益变量逐渐凸显<sup>①</sup>。从地区分布来看，成发散状从点到面已从周边扩展至全球，尤以周边国家、发达国家以及能源丰富的地区利益最为集中<sup>②</sup>。随着海外利益的迅速拓展，必然伴随着维护问题。2004年中国外交部设立了涉外安全事务司，专门处理和协调中国海外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工作。[23]在中国商船于索马里遭劫持后，海军编队不仅主动承担保卫多国船只的任务，显示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而且为中国商船护航，向世人昭示了维护自身海外利益的决心、意志和能力。

#### 四、政策重心的选择

总体上看，随着实力的提升与意识的增强，中国对国家利益维护的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

---

①海外利益包罗万象。既包括国家在境外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利益，也包括驻外机构和海外公司及公民侨民的人身及财产安全，还包括对外交通运输线及运输工具的安全等。为区分，本文专指与海外私企、公民个人有关的利益。

②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大部分集中在发达国家，较多依赖欧美市场和以日本、东盟、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市场。但从地缘战略角度出发，中国在亚洲和周边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正日益增加，扩展速度超过世界其他地区。中国与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中亚、中东和非洲）的经济合作近年来也快速增长，主要是中国对当地的能源（石油）与原材料（富铁矿，锰、铬、钾、盐、铜、铝等战略资源）需求强烈。刘新华，“论中国的海外利益”，《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年8月17日。资料来源：<http://cpc.people.com.cn/GB/68742/187710/191095/12464892.html>

但是，战略环境的复杂性造成国家利益维护的多重性，有必要厘清国家利益的轻重缓急，有针对性地施加影响力。尽管中国政府提出的新世纪三大任务——维护世界和平、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统一——隐含着国家核心利益的方向，而且2009年7月戴秉国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也曾概括了中国的三个核心利益——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但总体来看，中国官方文件中对此并没有明确说明。学界的观点也不同。“按其重要性等级，应为发展利益、主权利益和责任利益”。[19] (P51-52) “经济利益成为首要的国家利益。安全利益仍是我国的根本利益”。[24] “我国国家利益的排序是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16] “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构成国家战略利益的基本核心。国家经济利益是所有国家战略利益的物质基础，政治利益是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而安全利益则是政治经济利益在国家关系中的延伸”。[25]对此，本文拟从核心利益、根本利益以及重要利益三个层面对上述指出的内外七项利益变量进行归类。

核心利益是影响到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对国家前途与命运生死攸关的利益。周边安全与领土收复、两岸统一以及国内社会凝聚力和政权合法性建设属于中国的核心利益。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国家生存与安全都处于第一要位。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其首要功能就在于维护国家主权，保证领土完整和安全。安全利益不保，其他利益的维护就是一句空话。况且，没有一个世界大国是领土不完整的和分裂的<sup>①</sup>。国内社会凝聚力建设与政权合法性建设属于国内稳定与安全范畴。从近代历史上看，在中国这么一个多民族国家，一旦政府在凝聚力建设与政权合法性建设上出现大问题，很容易影响到国内稳定，甚至会四分五裂，届时周边各种安全问题也会激化。

根本利益就是对于国家的发展与稳定起到基础性作用的利益。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和维护海外利益属于中国的根本利益。没有强大的经济做后盾，一切军事和政治目标都是无根之草。国家形象建设也需强大的经济基础。中华文化广泛传播的汉唐时期，与当时勇冠全球的经济实力密切相关。对于海外利益维护，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对海外的资源依赖越来越大，比如石油有60%依赖海外。除非重回闭关锁国，工业化进程停滞，否则，维护海外利益不仅仅出于保护中国公民的个体利益，而且也为了保护国家经济发展触角的根本利益。

所谓重要利益是指对国家稳定与发展非常重要，处理上稍微不慎就会对其他利益维护带来负面影响的变量。就中国而言，国家形象建设和积极引导国民健康的历史观与大国心态属于重要利益。尽管目前中国在其他国家外交议程中的重要性的重要国际机制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但多数国家只是根据能否在经济、安全和外交上得到好处决定对华政策，严重缺乏根基，双边关系容易动荡。中美关系屡屡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的牺牲品正由于此。欧洲在希拉克、施罗德等老一代较为了解中国的领导人期间，对华政策较为友好，但在萨科奇、默克尔等新一批欧洲领导人上台后，中欧关系频频出现摩擦，以至于陷入低谷。说到底，国家间关系还是人民间的关系，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根基不牢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民众对华缺乏了解，甚至存有偏见。中国今天尽管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孔子学院越来越多，但很多人学习汉语不排除更多是为了和中国人做生意，并非热爱中国。这些都表明，在中国发展的瓶颈期，切实需要采取合理的手段加强国家形象建设，否则对华越是关注，误解、猜忌、担心就会越多，

---

<sup>①</sup>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国际法的角度，钓鱼岛和南沙群岛等有争议的领土在主权上属于中国不难证明，主要挑战在于如何在强大的军事实力保障下，善用国际与地区环境收回。

对中国发展造成的阻碍也就会越大。同时，由于近代历史上频遭劫难，在中国壮大后培养健康的历史观与大国心态也至关重要。否则发展起来的力量会被愤怒与骄傲所误导，给国家再次带来劫难。

## 五、结语

现实的利益维护要比学术上的分析复杂的多。而且在不同时期，不同利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和平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会提升，安全利益的紧迫性会有所下降。在国家安全危难之际，安全利益会成为第一要务，经济发展的紧迫性则次之。不同利益间的关系也很复杂。有时为了国家形象和凝聚力建设，需牺牲经济利益。而有时为了安全利益，则要暂时承受国家形象和凝聚力建设的损失，甚至需要暂时牺牲发展利益。中国目前是在与时间赛跑，以空间换时间，牺牲部分安全利益换来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但总体来看，在国家利益维护上要以核心利益、根本利益以及重要利益三个层次进行维护。在不能同时兼顾的情况下，牺牲或让步次要利益以换取重要利益特别是最高利益的胜利，通过“丢卒保车”实现利益最大化。

不可否认，我们在国家利益的界定与维护乃至学术研究上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国家利益究竟是国内绝大多数人民的，还是属于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如果是绝大多数人的，哪些人没有国家利益？如果国家利益被界定为所有个体利益的最大公约数，那么不属于最大公约数的那部分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什么关系？再比如，在国家主权利益方面，我们常说某某地方“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领土”，这在中国人看来当然合理，但这不是法权观念的表述。在西方人眼里，主权属于法权范畴，讲归属要讲法律根据，是以某某条约“签署并生效以来”的法律文本为依据。因此，如何在维护主权利益时既能用西方听懂的语言，又符合历史实际，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26]

### 参考文献：

- [1]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 [2] “国家利益的来源——读罗高斯基的《商业与结盟》”，《中评网》2004 年 8 月 22 日。资料来源：<http://finance.sina.com.cn/financecomment/20040822/1721966358.shtml>
- [3] “坚持国家利益至上是我制裁美售台武器公司的重要依据”。资料来源：[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280&articleId=18927](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280&articleId=18927)
- [4]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3 年版，第 330 页。
- [5] 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2002 年版，第 529 页。
- [6] 温家宝，“外交政策基本出发点是维护国家利益”，《腾讯网》2010 年 3 月 14 日。<http://news.qq.com/a/20100314/001479.htm>
- [7] Exuberance S. Pursu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the 1990s// Frankel B, Ed.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A National Interest Reader*.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National Interest, Washington, D.C), Lanham, MD. 1990:xi
- [8] Hastedt G P.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1:66-69
- [9] 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31 页。
- [10] Nye J S, Jr. Re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1999, 78(4):2
- [11] 高伟凯，“国家利益：概念的界定及其解读”，《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 年第 1 期。
- [12]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 页。
- [13]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9 页。
- [14] Yan xuetong,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资料来源：



<http://learn.tsinghua.edu.cn:8080/2000990147/interestbook/preface.htm>

- [15]王逸舟,“国家利益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161-162页。
- [16]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 [17]阎学通,“安全利益是中国首要利益”,《环球时报》2008年4月13日。
- [17]程毅,杨宏禹:《国际关系基础理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 [18]曲星、金玲、苏晓晖,“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是发展中国家”,《求是》2010年第18期。
- [19]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13-415页。
- [20]罗援,“对台军售,要让美国知道疼”,《国际先驱导报》2010年1月18日第7版。
- [21]威廉·恩道尔:《霸权之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吕德宏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 [22]王俊生:《朝核问题与中国角色:多元背景下的共同管理》,渤海堂文化公司(台北)2010年9月版。
- [23]钟飞腾,“后危机时代的中国海外利益”,《世界博览 中国卷》2010年第1期。
- [24]高衍玉,“西方国家利益理论对中国国家利益实现的启示”,《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46页。
- [25]“中国军队如何为国家利益拓展提供有力支撑”,《亚东军事网》2005年10月7日。资料来源:  
<http://www.warchina.com/news/ent/2009-12-27/117166.html>
- [26]张文木,“如何向世界准确表达中国国家利益”,《环球时报》2006年6月5日。